

阅读文章

##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

作者：汪信砚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 2005年9月22日 第194期

汪信砚近日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主要内容如下：

### 误区之一：教科书批判情结

回顾近2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程，应该说，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创新意识，最初源于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我们逐渐认识到以往通行的、源自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体系的严重问题，并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种问题的新探索。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仍然热衷于教科书批判，似乎以往的和现行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一无是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教科书批判情绪”。我认为这种情结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教科书批判情结的态度是非历史的。我国以往各个时期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着不同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水平，并曾培育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那些热衷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人，一般也都是通过这些教科书而学习、了解或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已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而回过头看，发现以往的教科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体系僵化、内容教条化、不注重说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有诸多不准确乃至不正确之处，等等。这本来是正常现象。然而，一些有教科书批判情结的人不对以往的教科书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无视它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是由于这些问题而对以往的教科书全盘否定、大加讨伐，这至少是粗暴地割裂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

其次，教科书批判情绪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带来了一些坏的影响。教科书批判中使用了一些概念，如“以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致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一些人在用各种激烈尖刻的言辞否定各种教科书；另一方面，我们又只能用这样的教科书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总体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教科书批判情结不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早已远远地超越了以教科书为代表的“讲坛哲学”，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问题也正在于没有很好地反映“论坛哲学”的成果。然而，直到今天，一些人仍然还在通过奚落教科书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的创新，这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是否超越了“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衡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与否的标准。如果满足于这种水准，不仅会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平庸化，而且也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 误区之二：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

有人说：“‘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心照不宣的流行话语。”我认为，这尤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的。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因而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竟还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只好谈论“学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因此，与一些人的判断相反，它不是什么“学科意识觉醒”的产物，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批判和自身的解放”，而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面对上述所谓的“流行话语”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取消论的冲击和挤压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谓的“学术性诉求”所诉求的“学术性”到底是指什么呢？

“学术性”是下个充满歧义的概念，它既可相对于“政治性”而言，也可与“现实性”相对待。为了迎合“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流行话语，为了避免与政治有任何勾联，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干脆对现实生活乃至整个外部现实世界采取下种规避的态度。他们所诉求的“学术性”，说到底就是一种不仅无关乎政治而且也无关乎现实的、空洞无物的学术的自我规定性；他们所谓的“学术性诉求”，似乎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成为一种对

现实生活世界毫不关心的、走着纯粹思想自我构成道路智力游戏的。这样下种“学术性诉求”，实际上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相悖的、纯形式主义的追求。

如果沉迷于上述那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性诉求”，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要实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就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破除那种对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关系的狭隘看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获取“真正的内容”。其实，哲学研究不仅不能脱离现实，而且也不应回避政治。比如说，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现代化建设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现实。如果要让这种“政治”也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那么，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或合法性本身就会受到挑战和质疑。

误区之三：对洋教条的迷信

2004年4月20日9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一文，提出了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的问题，尤其强调了反对对洋教条的迷信即把下些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奉为教条这种形式的教条主义的紧迫性。这种对洋教条的迷信，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多种表现，而最主要的则有以下三种：

一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家的概念和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也就是穆南珂先生所批评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即通过西方哲学这一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他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

二是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些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评价上，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常常以某些西方哲学家之是非为是非，而很少对这些西方哲学家们的是非观本身作具体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热”，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较多地受到了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至少反映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自信。更为重要的是，有这种形式洋教条迷信的人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要靠现代西方哲学家来担保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了，因为从其诞生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一直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诸难和挑战。正是在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论战中，而不是在他们的赞誉和喝彩声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显示出了非凡的理论生机与活力。

三是以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质性来论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粉墨登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一些人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辩护，来论说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其论证方式达致如下：现代西方哲学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或在别的什么方面与现代西方哲学具有同质性，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现代性。在这些人看来，马克思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甚至还开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性批判”的先声。总之，现代西方哲学中什么东西时髦，人们就会把什么东西“追溯”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种形式的洋教条迷信，其实是对一种幻影的迷信，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只是现时代的哲学，而现时代的哲学并不必然具有现代性；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只具有时间规定性的概念，一种哲学的现代性只有在与其与时代的问题和需要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

(2005-10-25 14:46:00 点击1210)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